

仇恨 沒有 未來

馬立誠 著

CHINA'S
"NEW THINKING"
ON JAPAN

中日關係
新思維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序 言

1984年3月25日，鄧小平在北京會見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時說：把中日關係放到長遠的角度來考慮，來發展，要永遠友好下去。這件事超過了我們之間一切問題的重要性。（《鄧小平年譜》下，968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7月版）

儘管發生了這樣那樣的矛盾，中日和解仍然是兩國關係最大的大局。從長遠角度看，中日和還是戰，既關係到中國現代化建設目標能否順利實現，也關係到亞洲一體化進程的成敗，同時還涉及世界的戰爭與和平。所以，中日關係是攸關全球興衰的大事。只有從這樣的高度來看待中日關係，才能把握住時代的脈動與需求。這就是鄧小平對日觀的精髓所在。

聰明的摔跤運動員會藉助對手用力的方向從而獲勝，中國話叫“四兩撥千斤”。這種智慧運用在外交政策中，收穫顯而易見。“對日新思維”就是這樣一種促進中日關係發展的新的思維方式。對日新思維是一種觀念方向的調整，不需要付出實際重大代價，就有助於解開死結。對日新思維強調，中日兩國應該克制各自的民族主義，超越歷史恩怨，實現和解。中日和解有利於實現兩國利益最大化，並能為亞洲與世界的發展和繁榮做出重大貢獻。

資深日本問題學者、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前副所長馮昭奎說，對日新思維是與時俱進的思想創新。歷史表明，凡是重大的思想創新，很難被所有人同時接受。對日新思維在 2002 年提出之後，立即在中日兩國引起轟動，並引發了持續 10 年的辯論。10 年來，對日新思維走過了曲折路程。值得欣慰的是，隨著時間前行，新思維得到社會各界越來越多的理解，特別是得到越來越多的青年的支持。多年來，我到各地特別是東南沿海走動，親耳聽到許多支持意見。2012 年 9 月反日遊行高潮之際，大量微博對越軌行為的反思與譴責也是一個例子。本書回顧了對日新思維 10 年起伏，也回顧了這 10 年中日關係的跌宕，重點評述近年來兩國關係的發展、曲折與希望，並以此作為中日邦交正常化 40 週年的紀念。鄧小平說：“我是熱心於中日友好合作的一個人。”（《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378 頁，裴華編著，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2 年 4 月版）我想，這也是包括筆者在內的許多中國人的願望。當然，實現這個願望的過程，也包含著要警惕和批評日本右翼損害中日關係的言行。

寫過《日本第一》和《鄧小平時代》等名著並且通曉日文和中文的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Ezra F. Vogel），2012 年應復旦大學邀請，在復旦發展論壇做了一次演講。他說：“中國的外交關係，重點是對日本和美國的關係。鄧小平的確是一個偉大的領導人。他 1978 年訪問日本。他說日本的文學可以給中國人看，電影、電視的節目都應該讓中國人看。這種交流使得當時的中國人對日本比較有好感。當然他們也會記得二戰中日本對中國人的傷害，但是他們關於日本人

的看法同現在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日本在二戰時期做了很多壞事，我們不能否認，但是中日關係中還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因素。所以，我想中國要和日本處理好關係，應該向鄧小平學習。”（上海《社會科學報》2012年11月29日）本書有一章的標題就是《新思維來自鄧小平和胡耀邦的對日觀》。

受到中國人好評的日本駐中國大使丹羽宇一郎，在2012年11月26日舉行的期滿離任記者會上說：“日中關係正處於風雨時刻，我心存遺憾。日中關係是超越夫妻的關係，夫妻尚可離婚，日中不能。人的壽命不過百餘年，但日中是幾千年的鄰居。”他還說：“通過和不少中國高層人士交流，我堅信中日關係有光明的未來。”

出乎人們意料之外的是，釣魚島爭端尚在持續之中，2012年11月，中日韓三國開始了自由貿易區談判。看來，中日之間密不可分的經貿關係發揮了作用。北宋王安石有詩云：“不畏浮雲遮望眼”。中日關係曾經經歷很多風雨，每一次遇到困難，都是經過雙方上下努力打破僵局，再往前開拓。總體來看，在全球化大氣候推動下，相信兩國領導層和有識之士會尋求和平途徑解決矛盾。這是全世界對中日兩國的期待，也是我寫作這本書的初衷。

鄧小平在1979年5月31日會見首次訪華的日本前內閣大臣、眾議院議員鈴木善幸時，曾有一次針對釣魚島問題的談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4月出版的《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一書326頁—327頁發表了這次談話，相信對今天能夠有所啟發。下面是這次談話的內容：

鄧小平表情嚴肅地提到了釣魚島問題。

鄧小平說，你們最近喧嚷得太多了。現在，我們兩國不宜在這個問題上糾纏不休。我在東京時就說過，這牽涉到兩國的領土主權問題，先擱一下。園田外相的說法我們是可以接受的——他說，為了珍惜兩國關係不要把這個問題突出出來。

鄧小平表示對日本官房長官在這一問題上的說法不能接受：“最近，我們政府就這個問題表明了我們的立場，這是我們不能不做的。”

接著，鄧小平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我們還是應該把這個問題擱起來，也可以考慮共同開發這個地區的資源，這個問題是不是可以考慮？”鄧小平請鈴木轉告大平首相：“是不是雙方都不宣傳，現由雙方商量，搞共同開發，不涉及領土主權問題。至於技術嘛，當然是日本出。我們雙方要在渤海灣聯合開發，可以組織聯合公司嘛。”

鈴木說：“剛才閣下提出一個獨特的主意，我將轉達首相，請他考慮。”

關於共同開發的辦法，鄧小平說，在訪日的時候他的腦子裡就在考慮。共同開發的無非是那個島嶼附近的海底石油之類，可以合資經營嘛，共同得利嘛。南沙群島也可以採取這樣的辦法。

中國共產黨十八大報告提出：“我們將改善和發展同發達國家的關係，拓寬合作領域，妥善處理分歧，推動建立長期穩定健康發展的新型大國關係。我們將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鞏固睦鄰友好，

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發展更好惠及周邊國家。”這兩句話，都和中日關係密切相關。新型大國關係前無古人，道路並不平坦。相信中日兩國能夠以智慧和勇氣進行探索和努力，克服障礙，走出一條和平、互惠的新路。這也是全世界的期待。

2012年12月8日

目 錄

第 一 章 石破天驚	13
第 二 章 《對日關係新思維》究竟是怎樣一篇文章	37
第 三 章 新思維來自鄧小平和胡耀邦的對日觀	57
第 四 章 吾道不孤——我的老師何方	71
第 五 章 感情不能代替政策：新思維兩員大將	81
第 六 章 別拿“愛國”當幌子：我在中環被打了嗎？	97
第 七 章 寬恕日本等於漢奸嗎——葛紅兵事件	107
第 八 章 理性克制盲動：朱良部長來信和袁偉時教授的文章	117
第 九 章 從破冰到暖春：胡錦濤和溫家寶的突破	129
第 十 章 巨龍 VS“草食男”：GDP 超越的反思	143
第十一章 日本政府 25 次道歉	161
第十二章 3.11 大地震拉近了兩國距離	177
第十三章 釣魚島風波的實質是甚麼？	189
第十四章 中日必有一戰嗎？	205
第十五章 仇恨沒有未來	221
附錄	
為了友誼與合作(溫家寶)	242
近代中日關係大事記	250
中日釣魚島爭端大事記	252

第一章

石破天驚

.....

新思維的主旨是，中國強大起來了，中日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而且這個差距將越來越大。在這種形勢下，應該從促進亞洲一體化的大格局出發，以堅持中國國家主權為前提，超越歷史恩怨，克制各自的民族主義，實現中日和解，在平等互利共同追求發展繁榮之際，冷靜地理性地解決局部矛盾和問題，包括釣魚島問題。

2012 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40 週年。本來，兩國關係在實現了“破冰、融冰、迎春、暖春”之後，應該紀念一番。但是，釣魚島爭端使中日關係又跌入谷底。這種形勢，多少類似 200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 30 週年的情形。當時，小泉以在職首相身份連續參拜靖國神社，兩國關係地表溫度急劇下降。中日關係的起伏曲折，深深困擾著兩國民眾和亞洲社會各階層人士。

怎麼辦？武力對決嗎？在全球化日益深入、亞洲一體化向前邁進、中日經貿關係密不可分的今天，兩國有識之士都認識到，不能選擇這條兩敗俱傷的路。那麼，怎樣以創新性思維化解兩國矛盾，尋求中日互助合作的未來？

10 年前，筆者依據鄧小平的對日觀，提出對日關係新思維。新思維的主旨是，中國強大起來了，中日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而且這個差距將越來越大。在這種形勢下，應該從促進亞洲一體化的大格局出發，以堅持中國國家主權為前提，超越歷史恩怨，克制各自的民族主義，實現中日和解，在平等互利共同追求發展繁榮之際，冷靜地理性地解決局部矛盾和問題，包括釣魚島問題。有些讀者也許注意到了，自從新思維問世一直到今，爭論都沒有停息，而且發生了很多出人意料的故事。鑒於中日關係的複雜程度，出現這種情況是正常的，也許還要再爭論二三十年。但是筆者相信，全球化和亞洲一體化的大趨勢，將會促使新思維發展為一條主線。不知讀者是否贊同這個意見。中日關係每時每刻糾結著國人的心，讀者也許會有興趣透過這一場爭論，回顧中日關係近年來的跌宕，共同思考解決困擾之路。

2002年12月19日。東京。

這一天，東京出版的發行人最大的中文報紙《中文導報》頭版，通欄大字標題格外吸引眼球：《馬立誠對日關係論石破天驚》。

該報記者張石撰寫的長文說：“今年雖是中日兩國慶祝邦交正常化30週年的慶典之年，但由於雙方在各種問題上的齟齬，中日關係的地表溫度似乎很低。從高層看，由於小泉在4月參拜靖國神社，使他10月訪華計劃流產；從民間看，《讀賣新聞》的問卷調查顯示，日本國民對中國的好感度降至1978年以來的最低點，認為中國可以信賴的人只有37%。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所11月刊出的一份調查結果顯示，中國人對日本感到親近的只有5.9%。在如此低溫狀態下，《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編輯馬立誠在最新一期《戰略與管理》雜誌發表一篇題為《對日關係新思維》的文章，批評中國國內媒體和輿論中瀰漫的反日情緒，筆鋒直指中日關係的核心問題。作為黨的喉舌的《人民日報》評論員，突發如此石破天驚之論，可以說決非偶然。”

該文說：“馬立誠首先在文章中指出，國土狹小，能源極其匱乏的日本能在經濟上高居世界第二，是亞洲的驕傲。這種提法與中國國內有些人在中日關係中持有的‘自我—他人’模式不同，將中國和亞洲作為一個共同的主體進行評論，可謂前所未有。第二，此文否定了中國有些人近50年來一直持有的日本軍國主義復活論的觀點，指出要把日本恢復正常國家狀態的軍事訴求，同重新恢復軍國主義的道路相區別。第三，首次提出日本的戰爭道歉問題已經解決。馬立誠在文章中說，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等人先後到中國的盧溝橋和瀋陽等地哀

悼，對日本發動侵略戰爭表示反省，日本道歉問題已經解決，不必拘泥刻板形式。這種說法可以說是直指中日關係的核心問題。如果馬立誠的文章真實表達了‘喉舌’之‘母體’的心聲，可以說中日關係迎來了歷史性轉折。”

文章說：“部分在日華人學者支持馬立誠。東洋學園大學教授朱建榮說，12月初，我又回了國。現在中國外交界和知識界都在考慮對日本的重新認識問題。這種變化的背景，是通過一二十年的交流，對日本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同時自己的經濟發展，也使中國有了自信。和日本及東南亞發展關係，也可以防止美國一極化，防止美國把矛頭對準中國。東海大學副教授葉千榮說，從馬立誠出版《交鋒》、《呼喊》開始，我就十分關注馬立誠的聲音，我始終把他的聲音看成中國不可缺少的聲音。馬立誠的文章絕不意味著對客觀存在的日本右翼勢力的軟弱，而是警醒大家，應該拋棄以狹隘的民族主義有色眼鏡看世界的思維方式。事實將會證明，形勢越發展，馬立誠的聲音將越重要。百年以來的中國歷史，已經無數次證明了這一點。這種聲音有助於中國在國際上立於不敗之地，並獲得更多的尊重。東京的華人作家王先生說，馬先生的思考正是我向來所主張的。不過作為一個僑居日本的人，不能說這些話，放膽說了，一頂漢奸的帽子就叫你一了百了。一位專門研究中日關係的華人教授說，目前中國的反日情緒，其實不是建立在對日本現實的全面了解之上的，只是把50年前的軍國主義和現在的靖國神社做了短路連接。”

《中文導報》介紹的這篇文章，是我在北京《戰略與管理》雙月

刊 2002 年 12 月出版的第 6 期發表的《對日關係新思維》。《中文導報》除了發表張石的評述之外，還全文轉載了《對日關係新思維》。

我為甚麼要寫這篇文章呢？這要從 2002 年 1 月我訪問日本說起。這一年，正逢中日兩國慶祝邦交正常化 30 週年。按說逢十慶典本該有一番熱鬧，可是兩國的政治關係卻冷冷清清。非但冷清，國內一些報刊和大量網民在論壇上批判日本“軍國主義復活”，達到一個新的高峰，大有掀動中日一戰的勢頭。

訪日兩週足跡所至，東京、京都、大阪，並未發現任何“軍國主義復活”的跡象。在日本，到處都見到中國人。當時兩國民眾每天往來人數已達 1 萬人。“熙熙攘攘，皆為利往”嗎？不敢斷言。但我看到的是，對兩國邦交正常化 30 週年這個話題，誰也提不起興致。至於兩國國民關係自 90 年代初以來的持續緊張，更不願公開提及。這種警警扭扭的氛圍，令人想起宋代詞人朱敦儒《昭君怨》的詩句：“往事總成幽怨，幽怨幾時休？”

這裡要提到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時殷弘稍後於 2003 年初發表的《中日接近與“外交革命”》一文。文中的沉痛說詞，正道出我寫此文的心境。他說，近些年來，中日關係中相當持久、廣泛和深刻的緊張，成為中國對外關係中特別令人擔憂、也特別催人思索的問題。尤其具有憂患意味的是，兩國關係中最突出、也最具深遠危險性的特徵，在於兩國大部分國民之間近年來迅速增長的互厭和敵意。

訪日歸來，我對這些問題思考了將近一年。思考的結果，就是當年 12 月上旬發表在《戰略與管理》的這篇文章。我平素主要精力是

關注中國的改革與發展，中日關係並非我的專業。但是，位卑未敢忘憂國，再說中日關係研究也需集思廣益，吸納社會各界意見，於是我寫成這篇文章，把國民關係持續惡化的種種問題尖銳地擺到桌面上，並提出了化解兩國緊張關係的新思維。這就是，走出歷史的悲情和陰影，實現兩國和解。

兩國很多學者說，這篇文章把兩國關係的“窗戶紙”捅破了。

上面所說的《中文導報》是在日本出版的中文報紙，其實日文媒體更是手疾眼快。發行量世界第一的報紙《讀賣新聞》（當時發行量為1200萬份），比《中文導報》早一週，2002年12月12日就在要聞版以醒目標題發表近半個版長篇述評，介紹《對日關係新思維》的主要觀點，當即在日本引起巨大轟動。

這裡且說一件小事。《讀賣新聞》發表文章的第二天即12月13日，日本伊藤忠商社東京總社急電北京分公司，要求在北京購買這一期《戰略與管理》雜誌，以最快速度空運東京。北京分公司的職員此前沒聽說過這份雜誌，北京街頭報刊亭也不出售這種嚴肅的學術雜誌。分公司職員打聽到我的電話，請我告訴他們到哪裡可以買到這份雜誌。我告訴他們，可以到中國美術館附近的三聯書店去買。

2003年2月21日，日本另一大報《朝日新聞》（當時發行800萬份）也發表了題為《馬氏論文要旨》的文章，介紹這篇文章的觀點，並發表了評論。

日本權威性政論雜誌《中央公論》月刊，以及影響力很大的文藝類綜合性雜誌《文藝春秋》月刊，不約而同都在2003年3月號翻譯

轉載了我這篇文章。日本時事通訊社辦的《世界》週刊，在 2003 年 1 月 28 日—2 月 18 日也翻譯連載了這篇文章。

當時任日本立教大學教授的高原明生（現為東京大學教授）在多個場合說：“馬立誠的文章展現了中國泱泱大國的氣象，中國盛唐時期就是這樣的氣象。馬立誠的文章表明中國恢復了自信。”

一個未曾料到的結果是，我這篇文章也使日本民族主義者有挫折感。日本一些網民說，日本右翼老說，中國人非常仇日，日本怎樣道歉都不行，怎樣支援中國建設都不行，中日關係絕對搞不好，日本人應該對中國人死心。長期聽到這些話不免有些灰心，現在看到馬先生的文章，說明中國也能理性地看待日本，表現出對日本的理解，令人感動。

一位僑居日本的華人學者給我發來郵件說：看到這篇文章，眼淚一下子湧出來了，文章說出了我內心的話，我因居住日本而不敢說。

東京另一份中文報紙《留學生新聞》於 2003 年 3 月 1 日也全文轉載了這篇文章，並展開討論。這一期報紙發表管建強的《評析 對日關係新思維——中日民間之憂 一文的“新思維”》一文，批評對日新思維。管建強說，日本有一些戰爭狂徒繼續策劃戰爭，《新思維》作者聽不到看不到這些人物，對日本的這些勢力揭露不夠。另外，日本政府的道歉不夠真誠和徹底，小泉首相還參拜靖國神社，日本就戰爭罪行的道歉與謝罪問題還未解決。還有，日本自衛隊的設置違反日本憲法第二章第九條（放棄戰爭條款），不能認為“日本恢復正常國家軍事狀態”是正常的事。管建強還認為，《新思維》一文對中國國內高漲的民族主義的批評是錯誤的。

東京《中文導報》3月6日發表報道說，最近在中國召開的三個座談會上，都有人發言支持新思維。

再看中國國內的反響。

2003年2月27日，《南方週末》第10版發表該報記者楊瑞春採訪我的長文《我為中日關係求解》，該文副標題是：“專訪《對日關係新思維》作者馬立誠”。在這篇文章中，我回答了楊瑞春提出的17個問題。我說，去了日本之後有很多實際感受，日本已經建立了成熟的民主體制，是不太可能復活軍國主義的。我們要把歷史包袱放下來，翻開新的一頁。中日力量對比發生變化的時候，應該從歷史情結中走出來。另外我說，我這篇《對日關係新思維》發表之後，日本民族主義者受到了挫折，因為他們一直把中國人描述得很可怕，但這篇文章給日本民眾不同的印象，這是很多中國網民沒有料到的。

同一天《南方週末》還發表了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王屏支持新思維的文章，以及北京大學教授梁雲祥反對新思維的文章。

王屏說：“馬立誠先生的文章發表時機選擇得很好，目前中日關係確實到了一個需要我們坐下來認真檢討、思考的時候了。選擇對日戰略方針，必須排除情緒化。中國民間，甚至在個別研究機構和政府機關裡，都只能說日本壞，不能說日本好。當然，日本有許多劣跡，不能不說。但日本也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為甚麼不能說呢？如果說了，輕者是‘親日派’，重者是‘漢奸’。這種‘民意’，對於國家利益會帶來多大的危害！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贊成馬先生提出的要對中日關係進行戰略性思考的觀點。”

梁雲祥說，首先需要日本方面不要再做傷害中國方面的事。再退一步說，中國寬容一些，先退一步，是否就會使中日關係走向友好呢？應該說，中國已經退過兩次，但並沒有從根本上換來日本方面對歷史的正確認識。

同一天，《南方週末》以“網上聲音”為題，摘要發表了互聯網上對我的指責：“部分網友從馬立誠的身份入手，說如果這篇文章是日本人寫的，我覺得很正常，但寫這篇文章的馬大先生是我黨喉舌《人民日報》評論部的主任編輯。另一部分激烈的網友稱馬為漢奸。還有一些網友則將問題的觸角集中在日本民族性格上，他們認為日本的民族性格決定中日不可能友好。以日本人的性格，只尊重強者。一些網友認為對日新思維不切合實際，我們在自我安慰地寄希望於日本人的良知，而他們卻認為我們這些可憐的第三世界在編造故事以敲詐他們的錢財。另外，一些網友認為中日之間缺乏友好的基本條件——信任，同時存在著巨大的利益衝突。馬立誠對於日本的主張是一廂情願。離開了信賴，不可能有真正的友好。”

3月4日，由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籌辦的東亞和平與戰略論壇在日本所召開成立大會。來自中央黨校、中國社科院、外交學院、軍事科學院的學者在會上就中日關係問題進行交流，我也發了言。支持新思維的和質疑新思維的學者大致旗鼓相當。

會上，推選我為東亞和平與戰略論壇副理事長。由於我素來不是此界中人，因此表態不願擔任，但社科院的一些朋友不由分說一定要把我放上去。事後報到院部去批，結果院裡某位領導不贊成新思維，

把我的名字從理事長名單當中劃掉了，改為普通研究員。朋友只好苦笑。我在這一年 7 月赴香港鳳凰衛視任職，也就和論壇沒有來往了。

4 月，扮演先鋒的《戰略與管理》雜誌第 2 期發表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時殷弘的重要文章《中日接近與“外交革命”》，支持對日關係新思維。時殷弘說，中日兩國民眾的敵意發展下去，對中國相當危險。中國大陸經不起在一個往往敵對的美國、敵對的台灣以及可能敵對的印度之外，還面對一個敵對的日本。從全局出發，應該大力改善中日關係，實現中日接近。中國對於改善中日關係的實際需求，大於日本在這方面的需求。時殷弘還提出了中國可以做的改善中日關係的五件大事。《南方週末》2003 年 6 月 12 日發表孫亞菲的文章說時殷弘的文章“主旨類似於馬文”。此後，時殷弘就中日關係還發表了一些文章，下文詳細介紹。

在網上，時殷弘也成了咒罵的對象。

6 月 9 日出版的《中國新聞週刊》2003 年第 20 期發表該刊記者胡奎的文章《穿越歷史的迷霧》，介紹了我的文章和時殷弘文章的觀點，表明該刊支持新思維。

6 月 12 日，《南方週末》再次介入討論，態度略有變化。該報記者孫亞菲的文章《對日關係需要不需要新思維》介紹了各方面對新思維的質疑與批評。有讀者說，這篇文章反映了新思維問世之後遇到阻力。

6 月，中宣部主辦的《時事報告》雜誌邀請我、時殷弘、孫叔林、魯世巍四人參加該雜誌召開的中日關係座談會。這本雜誌發行量竟達 50 萬份之多，是專供黨內基層幹部閱讀的刊物。我們四人在發言中都

認為，對日關係要有新思維。該雜誌 7 月號用 10 頁篇幅發表了我們四人的發言，有力支持了對日新思維。中宣部主辦的雜誌如此支持新的思想，殊為不易。當時主持雜誌的總編輯是曹分田，副總編輯是曹勃亞、鄧乃剛。我和時殷弘在發言中非常讚賞胡錦濤提出的中日關係要“放眼長遠，籌謀大局”這 8 個字。

7 月 18 日，鳳凰衛視“世紀大講堂”欄目邀請我演講，題目就是《對日關係新思維》。我講了新思維的主要內容，並回答了大學生提出的問題。鳳凰衛視節目播出之後激起了互聯網又一波討論熱潮。同時，一個署名為“愛國者同盟”的網站開始徵集簽名，反對引進日本新幹線技術。

7 月 28 日，中華日本學會在京召開會議討論中日關係。三位人士發言痛罵我和時殷弘的文章，說這兩篇文章“立場錯誤”，“被日本人利用”，兩個作者“是日本的代理人”。日本研究所一位研究人員發言不同意亂扣帽子，並提出問題說：為甚麼這樣兩篇有突破意義的文章沒有誕生在日本所呢？

7 月，《時代潮》雜誌第 14 期發表林治波的《對“對日關係新思維”之九點質疑》。該文說：“日本對侵略戰爭拒不反省的錯誤立場和對中國的不友好態度，才是中國人民對日本缺乏好感的原因。”林治波認為，日本是靠掠奪和戰爭才養肥了自己，日本富強之後，給亞洲帶來了災難和浩劫。日本謀求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地位不是正常的訴求。日本是東亞經濟一體化的障礙。中國並不存在狹隘的民族主義。對日新思維站不住腳。林治波在 8 月 15 日的人民網還發表了《“對日

關係新思維”再質疑》，逐條批評時殷弘在《中日接近與“外交革命”》一文中表達的觀點。林治波認為，中日關係不存在大為改善的餘地。倘若中國謀求中日接近，將會使日本成為中美爭奪的對象，抬升日本的身價，而且會強化美國對中國的警覺和敵意，強化美國對中國的圍堵，甚至促使美國改變中立立場，在台灣問題上鋌而走險。

針對林治波的觀點，小國寡民等網友在鳳凰網 8 月 19 日論壇上給予駁斥，指出日本政府已經多次就戰爭問題進行反省和道歉，日本極少數右翼不能代表日本政府和人民，“林先生拋出類似冷戰宣言的文章，所代表的動向值得注意”，“這對於轉換期中的中日關係，對於中國的國際形象，造成了惡劣的影響與傷害，對中國的與時俱進、進一步解放思想的運動，是一個倒退”。

8 月 1 日，外交部主辦的《世界知識》雙週刊第 15 期發表一組討論中日關係的文章。

首篇是新加坡人卓南生（日本龍谷大學教授）的《究竟誰更需要新思維》。該文全面否定對日關係新思維，認為今天的日本比上世紀 50、60 年代的日本更兇險，更可怕，更好戰，對歷史問題的認識更為倒退。因此，“現在需要的不是亞洲人民出現甚麼新思維，而是需要日本政府出現新思維”。卓南生說，《對日關係新思維》一文“使日本如獲至寶”。

中國社科院日本所研究員金熙德的文章批評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但他又說：“同時我也認為中日之間不能因為靖國神社問題中斷中日間的政治交往和軍事交往。”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王新生的文章說，在靖國神社問題上確實存在文化差異，但日本必須顧及亞洲國家的感情。他還說，由於中日經濟強勁互動，即使有摩擦，關係也還會發展。

外交學院教授江瑞平的文章說，日本經濟依賴中國的因素在加強，中國經濟發展中的日本因素在減弱。長此下去，雙方的實力對比會發生變化。

8月7日，《參考消息》報為紀念中日締結和平條約25週年，發表四個版文章。其中香港中文大學年輕學者張望的文章《正確面對“正常日本”》提出，要在傳統對日觀和新思維兩者之間尋找平衡，即要以平常心看待日本“正常國家化”，又不能在歷史問題上退讓。

《南風窗》半月刊在8月（上）一期發表程亞文文章《如何讓日本需要中國》。文章說，日本沒有把自己當作亞洲國家，“身在亞洲，但‘神’不在亞洲”，很難和亞洲國家建立緊密關係。只有先疏遠日本，才能“激發”日本認同亞洲，與中國接近。

8月16日，《世界知識》第16期發表該刊與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月刊為紀念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25週年聯合召開的座談會發言。

王逸舟，時任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他在發言中強調理性和寬容，委婉表達了對新思維的理解與支持。他說，正在崛起的中國，不僅要有建設性姿態和負責的形象，也應當有泱泱大國的風範，應當用更加理性和寬容的態度看待國家間的爭議。

時殷弘在發言中強調戰略集中原則，提出不妨大致擱置歷史問題。